



人间佛教
研究论丛

主編

懷宇烈
怡 誠

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
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蕾蕾 著



人间佛教
研究论丛

主编

楼宇烈
魏 藏

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
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蕾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张蕾蕾著;楼宇烈,怡藏主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88-0263-0

I. ①近… II. ①张… ②楼… ③怡… III. ①佛教史—研究—北京—近代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8252号

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

——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蕾蕾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1092毫米 16开 14.25印张 200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263-0

定 价:40.00元

人间佛教研究丛书

主 编：楼宇烈 怡 藏

副 主 编：净 因 圣 凯 张志强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美 王 颂 王雷泉 孙英刚 池丽梅 李四龙
纪华传 李建欣 陈 兵 陈金华 陈永革 杨曾文
杨维中 张风雷 张文良 宋立道 何建明 学 愚
洪修平 麻天祥 黄夏年 赖永海 魏道儒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义 广 圣 凯 向 学 伍先林 可 潜 永 平 宗 性
净 因 昌 如 明 海 明 杰 济 群 持 定 定 明
张志强 能 仁 湛 如 惟 善 惟 祥 智 海 源 流

主编机构：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雪窦山佛教协会

项目执行：

能 仁 定 明 法 雨
持 定 惟 祥 永 平

总 序

两汉之际，佛教经由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民众生活激荡融合，逐渐形成了丰富璀璨的中国佛教。反思中国佛教的发展，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需求，也是佛教“契理契机”精神的具体体现。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传播，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应运而起。

20世纪20年代初，佛教复兴运动领袖太虚大师（1890～1947）针对当时佛教界重视前生来世、以“天”“鬼”为中心而忽视现实人生的倾向，特提出“人生佛教”理念予以对治。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精神与方向是重视现世人生问题的解决，学佛的目的是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太虚大师主张在坚持佛教根本精神的立场上，适应社会潮流的变化，契合时代需求，保持佛教在时代社会中的发展与进步。1933年10月，太虚大师在汉口市商会作《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讲演，又明确提出要建设“人间佛教”。由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期刊《海潮音》杂志特地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人间佛教”由此成为中国佛教界继承传统、别开生面的一股新思潮，获得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同。

“人间佛教”思想提出近百年来，已成为主导当代中国佛教实践追求的新方向和中国佛教现代化的新道路。1981年，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撰《佛教常识问答》，第五章的最后部分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开启了大陆佛教在“文革”后对“人间佛教”的正式倡导。1983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强调了提倡“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答案。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将弘扬“人间佛教”

置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地位。“人间佛教”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现实社会生活各层面得以深入贯彻。喜饶嘉措、圆瑛法师、巨赞法师、正果法师、明真法师、净慧法师等一大批近现代高僧大德为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与弘扬贯注了无数心血和智慧。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佛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机构，一直致力于整合教内外研究资源，联合学术界共同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系统化的佛学研究，推动佛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促进佛学研究国际交流，不断提高佛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关注人间生活，践行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和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两千多年佛教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

中国佛教又重新站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机遇——一个中西文明汇遇的时代，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对中国佛教的弘法、传播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商品经济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经济、制度乃至修道带来巨大的冲击。太虚大师圆寂至今将届70周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当此殊胜因缘，特别联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组织《人间佛教研究论丛》，试图梳理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与源流、总结人间佛教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展望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方向，积极顺应时代需求，以促进当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想自觉。因此，从历史的总结、当前处境的反思中，为中国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方向的指引。

《人间佛教研究论丛》编委会

2016年9月

序

温金玉

宋朝的如净禅师曾言：“佛法是出世间法，不能苟合于世间法。”佛法的主旨在于化世导俗，强调的是于世而离世，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应该说大乘佛教不共的是出离心，不二的是菩提心。如东晋慧远所说：“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从历史上看，“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兴衰始终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来就没有一条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运行的轨道。佛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连在一起。

蕾蕾博士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就读，后考入我门下专攻佛教研究。考虑到她原有的学业背景，最终商定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在传统佛教研究中，专业研究者往往关注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成为以儒释道为主体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实体生活样态，求宗不顺化，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特立独行，佛教寺院的存在方式对于佛教本身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植根于社会民众之中的宗教不是建筑于空中的楼阁，在其博大精深的教义系统、令人赞叹的弘传过程背后，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等物质性因素的支撑。因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演绎史，更是一部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层面密切相关的社会史，社会物质经济层面的研究应成为佛教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蕾蕾博士的研究视角是值得肯定的。

近年来,社会生活史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向。跨学科研究打破以往的学术藩篱,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得以实现并加强。另一方面,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而方法论也更趋于多元,引入了对民众意识、信仰史、心态史的探讨。因此以整体历史观为前提,在跨学科研究基础上,开拓新领域,引进新思维,运用新方法,实现对历史对象的新认识、新综合,就成为一种从宏观叙述推进至微观考察的学术探讨范式。正如蕾蕾博士在本书中提到,“诸多相关著作通过重大事件(如庙产兴学、佛教革新)与著名人物(如杨文会、太虚、印光等)已经为我们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近代佛教史宏观图景。然而,佛教真实的生存样态,一个地区的佛教实况与普通僧众的现实生活却依然难以从中窥见”。唯有将佛教与其日常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得到佛教发展的真实图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近代佛教史的宏大叙事中,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寺院僧人在具体历史中,有着怎样的生存样态,又是怎样适应并参与到大时代脉动之中的。有鉴于此,笔者选取地域性佛教这一研究方向,并借助历史学中‘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探索近代佛教生存与发展中制度生活层面的诸种问题,力图展现近代北京地区佛教社会生活的实况”。这可看作是本书写作的初心,从方法论的角度,也是值得肯定。

除了选题意义、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的运用之外,本书对资料的选取也值得一提。有了好的选题,如何能用坚实的论据构筑起自己的思想大厦,则需要丰厚的资料作支撑。从地域性佛教研究来看,近代佛教学者还没有将注意力更多放到地域性佛教研究的视阈上;另一方面,地域性的研究又鲜有专门涉及佛教者,本书所做的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意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资料的丰沛完整就显得异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本书大量运用了北京现存档案资料。档案作为官方文献记载,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程序化的忠实记录,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使得较为深细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可能。除此之外,本书尚大量参阅了北京方志、佛寺志、民国佛教报刊、北京地区报刊、时人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等。所有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上,使得本书的许多叙

述与结论具有了真实性与可信度。

总的来说，本书选择以近代北京佛教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控相结合的论文结构，结合民国时期北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对近代北京佛教的寺院法统与住持传承制度、僧尼实际生活方式、寺院经济状况、佛教与政府社会间的互动关系等做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描述；从中揭示了近代北京佛教追求革新与固守传统间的真实情景，对深化北京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蕾蕾博士毕业后，我曾几经敦促她修改出书，如今得知她的论文即将面世，虽有种种不足，亦甚感欣慰。近代北京佛教在中西文化交流、南北僧团交织的情形下，呈现出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都市佛教气象，英杰辈出，张力频现，有着无尽开拓研究的可能。此次以博士论文的“原生态”呈现，忠实地反映了她求学历程中的一行足迹。愿她莫忘初心，坚守对学术的热爱与忠诚，在未来的日子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总 序	1
序	温金玉 1
第一章 导言	1
1.1 作为社会生活史的近代佛教研究	1
1.2 史料构成	4
1.3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11
第二章 近代佛教的缩影：以北京法源律寺为个案的研究	13
2.1 法源寺历代法统与寺院的宗派传承	13
2.2 清末的志果接位及传法道阶（1909—1911）	21
2.3 北洋政府时期道阶法师对法源寺的经营与涉讼（1912—1927）	25
2.4 短暂的奉系军阀时期倭虚的接手（1927—1928）	39
2.5 国民政府时期空也法师的被撤与复职（1928—1932）	41
2.6 日据时期梵月住持、掌控下的法源寺（1933—1945）	52
2.7 抗战胜利后的法源寺（1945—1949）	59
2.8 小结	59
第三章 近代京城僧尼的生活制度	62
3.1 近代北京佛教寺僧现状	62

3.2 佛教传统组织形式与现代之新变化	72
3.3 民国佛教传戒——宗教职业者的准入制度	90
第四章 近代北京佛教的寺院经济	95
4.1 北京近代佛教寺院的“恒产”	95
4.2 北京佛教的经忏佛事	107
4.3 捐赠与化缘	120
第五章 近代北京佛教与政府的博弈	125
5.1 近代北京政府对于佛教的管理	125
5.2 近代北京佛教寺庙与政府的互动	145
5.3 近代北京佛教的社会参与	154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68
附 录	179
后 记	213

第一章 导言

1.1 作为社会生活史的近代佛教研究

晚清民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对于国家人民自然是不幸的；对于今日之学者而言，其间各种风云激荡、制度变迁却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料宝库。“欧风美雨”洗涤下的近代中国，深受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交织影响，社会各层面相对以往都越发纷纭复杂，处于这一广阔时代背景下的佛教亦复如是。

近代佛教的研究所涉庞杂，在诸多著作成果中，佛教的变迁、或者说对传统的革新成为了近代佛教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与热点，轰轰烈烈的“变革”“变迁”被视作这一时期佛教的主基调。然而，所谓被“变革”的传统依然有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怎样强调变革，历史终究是连续而非断裂的。若要全面考察近代佛教的情况，就不能将眼光仅仅放在重大的事件或者革新上，而应该对于佛教的传统及各个层面的问题予以通盘考虑。

赵世瑜教授曾说过，“我们习惯于处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著名人物，之后，当我们转入内地进行观察，我们忽然会觉得如脚踩棉花，软绵绵地无从着力”^①，笔者在研究近代佛教史的过程中也有此感：诸多相关著作通过重大事件（如庙产兴学、佛教革新）与著名人物（如杨文会、太虚、印光等）已经为我们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近代佛教史宏观图景。然而，佛教真

^①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48页。

实的生存样态，一个地区的佛教实况与普通僧众的现实生活却依然难以从中窥见。美国学者 Holmes Welch（本书简称为维慈）在《近世中国的佛教制度》一书中写道：“中国佛教之最重要者，乃为寺院生活之制度，可作为其教理之体用的一个示例。我们所注意者，即是其制度。其原意乃欲创造一个模范的社会，使整个世界可以模仿。这样，即有一切理想国之感应。其理想真是引人，其实现亦甚惊人，而其失败之处，则需同情的了解。”^①唯有将佛教与其日常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得到佛教发展的真实图景。

因而，在近代佛教史的宏大叙事中，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寺院僧人在具体历史中，有着怎样的生存样态，又是怎样适应并参与到大时代脉动之中的。有鉴于此，笔者选取地域性佛教这一研究方向，并借助历史学中“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探索近代佛教生存与发展中制度生活层面的诸种问题，力图展现近代北京地区佛教社会生活的实况。

最早对中国近代佛教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著有专论的，是日本佛教界的活动家水野梅晓。水野梅晓是日本曹洞宗僧人，他研究中国佛教问题是为了对华开展活动的需要，并非出自学术目的。水野梅晓于1925年和1926年分别出版了《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和《关于支那佛教的现状》两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论著。维慈曾于美国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从事研究活动，从1960年代以后，他先后出版了《中国佛教之制度1900-1950》《佛教在中国的复兴》和《毛时代的佛教》三部有关近现代中国佛教问题的专论。尤其是《近世中国的佛教制度》一书，通过实地探查与深度访谈，详尽描述了近代中国佛教的生活制度，堪称近代佛教生活史的百科全书。不过，该书的写作主要基于南方寺庙的情况，对北方寺庙较少涉及。1980年代以前，还有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的《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的《中国近世佛教史诸问题》、美国学者陈荣捷的《现代中国宗教的趋势》等，这些论著触及近代中国佛教的诸多领域。进入1980年代，台湾僧人东初的《佛教中国近代史》问世，是以中国佛教史为讨论主题的专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袤的国度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特征的区域

^① [美] 维慈，《近世中国的佛教制度》，包可华、阿含译，台湾：华宇出版社，1985，第275页。

文化，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自然也表现有很强的地域性^①。因而若要对近代佛教的实况有一深切的认识与真实的体验，深入考察地方性佛教的情况是必需的，佛教区域化研究，尤其是地方佛教史的研究在近些年来日渐深入，涌现出一大批相关著作，如陈永革的《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以浙江省的佛教为例描述佛教弘化形式在近代的转变；新疆塔里木大学的廖肇羽、贾东的《再续小西天的佛教文化薪火》，探讨了西域佛教在特定地区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此外，以问题意识探索地域性宗教的著作值得关注，马晓军的《甘南宗教演变与社会变迁》以甘南地区为例，探讨了多民族杂居地区宗教文化的整体结构性变迁；赵春晨、郭华清、伍玉西合著的《宗教与近代广东社会》梳理了广东地区各宗教的活动情况及其社会影响，总结了近代广东历届政府的宗教对策与宗教管理上的利弊得失；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则是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对青岩宗教现象的研究透视当地社会运作和文化演进的规律。这些成果为做地域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

至于近代北京佛教的研究，佛教学者少有涉足，关注者多为历史学、社会民俗学及“北京学”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曾与法国合作了名为“圣城北京（Peking as a Holy City）”的一个研究项目，中有多数成果涉及宗教与佛教层面（发表于《三教文献》2007年1-4期）。在学位论文方面，有北师大张宏艳的硕士论文《明清宦官的终老与京师寺庙》，讨论了明清两代宦官与寺庙的关系；周锦章的硕士论文《寺庙大杂院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以北京西四北三条隆长寺为个案》，以隆长寺为例叙述了寺院在近代社会的变迁。在发表的期刊论文方面，有董晓萍《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一文，以洪福寺为个案说明了近代寺庙与铺保之间的关联；另有付海晏的《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以民国铁山寺案为线索，讨论了1930年代前后庙产纷争的实态与复杂面相。而“北京学”的

① 严耀中、谢宝耿，“古史研究：从多方结合到独辟蹊径”，《学术月刊》2004年8月，第107页。

本书对地域性佛教的梳理没有将台湾、西藏这两个特殊的区域包括在内。

学者如佟询等所著的《北京宗教文化研究》也为我们了解北京佛教提供了全景的展示。在外文研究文献方面,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挑战过去认为明清是连续的假说,透过城市寺庙来看共同体与地域认同的形成,指出中国在现代早期所出现的新发展,特别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新的机制和动员习惯,延续与影响到20世纪的现代。法国高万桑教授(Vincent Goossaert)《老北京的道士(1800-1949):都市僧道的社会史研究》展现了近代北京道士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道士在都市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上述研究著作或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切入,或是论述整体宗教的状况,虽然形成了相当精彩的研究成果,却很少有专门的近代佛教研究著述。一方面,近代佛教学者还没有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地域性佛教研究的视阈上;另一方面,地域性的研究又鲜有专门涉及佛教者,笔者所做的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1.2 史料构成

近代佛教研究所采用的资料,在一开始是以寺僧的文集著作为主。如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郭朋等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高振农的《佛教与中国近代文化》、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陈兵、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永革的《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等等著作,无不以僧人的著作、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主要的资料来源。1998年出版的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一书,则开始注重对民国佛教期刊的利用,为近代佛教史的研究拓宽了新的研究视阈与史料来源。随着《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及其《补编》的出版,民国佛教的期刊报纸成为唾手可得的研究史料,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和使用。民国佛教期刊的大量出版发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来源,然而其主要还是佛教界自我表达的宣传工具,如维慈所言,“某些

已刊行的现代僧侣的传记及近代的寺院历史显然都有圣徒化与形式化的倾向”^①，从期刊中得到的对近代佛教的认识依然是不全面的，需要其他资料的辅证；寺僧文集关注更多的则是思想与义理，如要进行更深细的地域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就必须挖掘新的史料。

在这一点上，档案具有文集、期刊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档案是官方文献记载，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程序化的忠实记录，纠纷时双方的立场都能呈现其中；而佛教期刊及僧人文集回忆录等大多“为尊者讳”，遇到对自身不利的事件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辩解。档案虽然比较程序化、公文化，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使得较为深细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可能。以往档案多是在历史学领域使用，少有佛教学者关注，在佛教研究领域利用档案进行的研究为数不多。目前，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对档案的关注越来越注重地方区域性乃至地方机关团体的档案，笔者试图以本书的研究为契机，唤起佛教学者对地方档案利用的重视。

本书的研究基于对北京市馆藏民国寺院档案进行的整理与分析，因而档案是本书最重要的资料来源。除此之外，笔者尚大量参阅了政府之外的民间资料，主要有北京方志、佛寺志、民国佛教报刊、北京地区报刊、时人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等。现分述如下：

（1）档案

据笔者考查，位于南三环蒲黄榆路的北京市档案馆保存有民国档案 82 万余卷，各区县档案馆保存有 8000 余件，首都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北京市博物馆亦保存有部分有关北京情况的民国档案^②，其中以市档案馆所存的佛教档案为最多，其他几处的民国档案基本上没有涉及佛教者。

市档案馆的 82 余万卷档案中，真正能够对外开放查询阅览的只有 447711 卷，其余因为各种原因暂不对外开放。在这开放的四十余万卷档案中，

① [美] 维慈，《近世中国的佛教制度》序言，包可华、阿含译，台湾：华宇出版社，1985。

②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档案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第 19 页。